

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丛书

社会学 的政治想象

刘拥华
著



SHEHUIXUE DE
ZHENGZHIXIANGXIANG

本书由一篇“序”和五篇长文集纳而成。在这些文字中，作者尝试纳入政治的维度，探索社会学的政治想象，倡导“政治地思考”，进而思索社会学如何可能超越它内在的危机。这些文字，构成一段“寻找政治之旅”。

国社会出版社

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丛书 ■

社会学 的政治想象

刘拥华 著



SHEHUIXUE DE
ZHENGZHIXIANGXI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学的政治想象 / 刘拥华著. —北京: 中国社
会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087 - 5179 - 5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政治社会学—文集
IV. ①D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3841 号

书 名: 社会学的政治想象
著 者: 刘拥华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王 前
责任编辑: 杨建萍
责任校对: 罗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编辑室: (010) 58124837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序)

主 任：文 军 吴瑞君

成 员：丁金宏 王晓葵 Nick Tapp (王富文)

文 军 田兆元 李向平

吴瑞君 黄晨熹 黄剑波

总序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说，社会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近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剧烈变革的极度关注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学科的命运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的命运一样，它们是在互为哺育中紧密伴随而共同成长的。

然而，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却处处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犹如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也一直充斥着各种难以厘清的问题甚至矛盾。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人们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在城市里，人们获得了独处的机会，但必须同时承受孤独与冷漠；在城市里，人们有了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几乎都是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虽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但也会变得更加无情。当初，那些为了摆脱传统乡村“束缚”而到城市中寻找“自由”的人们，如今他们却必须学会适应这个“陌生”和“无奈”的社会。因此，现代城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表征人类联系的某种具体形式，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联性，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会地，也是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演绎场所与流动的空间。可以说，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满着魅力、迷惑甚至矛盾，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

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机器”，正在迅速地催生中国“城市奇迹”的出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进入了世界500强城市之列。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增加，社会与文化危机事件接连而起，呈现出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的态势。以当前中国许多城市普遍追求的城市化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就成了现代性张扬的一个极好的展示舞台，在“经济增长”和“GDP主义”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自然充当了发展主义的“排头兵”，并在人类历史较短的时期内就创造了一个一个的“城市奇迹”，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把一块块恬静幽雅的田园变成了拥挤不堪的热土。直到现在那些没有很好地实现城市化的地区还在后悔当初没有抓住机遇，希望自己能够急起直追，用城市化来彻底改变自己落后的命运。这种城市的经济奇迹与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独特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治理，还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体验产生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这种“城市奇迹”与城市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且急需探究的理论议题与现实问题，也亟待城市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应当始终培养一种实践品格，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直面中国城市社会的重大公共议题，参与公共辩论，增进公共理性。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雄厚的根基，自1913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建立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在其前身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术前辈的开拓性贡献下，就为城市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立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伊始，华东师范大学就率先并明确提出了把“城市社会与文化”作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经过

30余年的学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逐步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培养体系，不仅设立了以共同突出“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为学术特色的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人类学四个专业博士点，而且还建立了一批跨学科的城市研究机构，并由此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核心组成单位。

2009年，在原社会学系和人口研究所的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整合了校内社会学学科资源和城市研究队伍，建立了社会发展学院，下设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人口学研究所、民俗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研究所五个基本单位，各专业在继承“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均衡发展和有效管理。为了进一步凸显这一学科特色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学院拟以丛书的形式组织和资助一批学术专著的出版，并明确强调该丛书不仅要突出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原创性、实证研究特色，而且要积极鼓励各种跨学科、前沿性、国际化的城市研究，不断拓展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的视野。本丛书所有受到资助出版的专著都是经过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代表了近期学院有关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作为问题意识，通过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多面向解析，自觉地把“城市研究”的视野与“现代性反思”的论域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意义上推动以“社会与文化”为中心的城市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近年来“城市研究”之所以渐成热点，不仅是其顺应了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即企图超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析范畴，寻找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更具体、更微观同时也更生动的分析单位，更重要的是，“城市”始终处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变迁轨迹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也是人、社会、环境多向互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在“现代性反思”的视野中，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历程、社会动力

和文化影响，而且必须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与经济环境、人文地理、自然生态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予以重新定位，通过现代性的反思来促进中国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提升，进而培育出一个能够激发更多学科兴趣的城市研究方向和学科特色，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后持续努力的一个共同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军

2014年国庆节·上海

序：发现政治之旅

每本书背后都会有一个或多个故事，有关自己和这本书的故事，或长或短，或精彩或冷寂，但都是一段心路历程的告白。这本书也不例外。

这本由5篇长文构成的“书”，能否称得上是书，我不敢论定。但这5篇文字的创作，都各自有着一段特别的运思经历，却是我最为看重的。这些奇特经历也说明，有着一段特别的时间，作者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或者说，在读、思、写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美好而艰辛的体验，而这些零零碎碎的体验，也构成了作者本身。因此，回过头来看，倒不是说文字写得如何的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为何写这些文字，又如何将这些文字磕磕绊绊写完的历程，这份迫切要写作的冲动，这段沉思的时光，回味无穷，特别令人怀念。时至今日，依然还有诉说的欲望和写作的热情，实属幸运。

5篇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现在，历经8年之久，也即我博士毕业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时间。这8年间，我从长春来到了上海，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老师，变化很大。最大的变化或许是，在这么多年的读书和思考过程中，我逐渐地意识到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读书，并学会如何去切近这个世界、体会这个世界的苦难，这或许是最难做到的，需要不断地失败、磨难、曲折才能有所收获。因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5篇文章，是自己从失败不断走向失败、再逐渐地有所领会的见证。或许，正因为如此，虽然读者们对本书中的文字或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敝帚自珍之情还是甚为浓厚。

这么多年的读书生涯，萦绕于心的，依然是人世间的太平。这种太平来自于政治的奠基。现代社会缘起自然法学派所奠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而这一体系与政治秩序息息相关。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证，即一方面，国家具有某种道德性，国家无法进行自我论证，而必须基于国家之上的规范体系才能证成国家的正当性，这即是说启蒙价值具有某种普适性；另一方面，价值和道德体系的生成，不是自天而降，而是与现代人的公共参与密不可分，与现代政治紧密相关，甚至于就在政治当中。这也是涂尔干的初衷，或者说，自由和权利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天赋人权”。而现代人亦是从这种政治中获得更为深刻的自我理解。这本书，多多少少寄托着我对政治社会以及政治人的某种想象，某种理想，以及某种莫名的宣泄。无论如何，这是这几年来走过的路，路很长，在未来，还会继续走下去。

二

2007年7月，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08年，给学生开了一门“社会学原著选读”的课程。在每上一门课程之前，我都会认真地思考，这门课程应该如何上才好，做到既不委屈自己，也不委屈学生。原著选读之类的课程，难度可想而知。2008年盛夏，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听过渠敬东老师讲授涂尔干，激发了我的热情。为了避难就易，我选择一个人物即涂尔干，作为课程的主线索，来理解经典社会理论。这样一来，我便接触到了涂尔干的世界。进入涂尔干的世界是异常艰难的行进，他的书难读难懂，艰深晦涩，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子坏了，无法跟上涂尔干的节奏，被他戏弄着，无法自己。这个过程很痛苦，

不堪回首，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但通过这门课程，涂尔干的大部分书都浏览了一遍。这样一来，我便有意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写涂尔干，这便是《以社会学重构个人主义——从卢梭到涂尔干》一文的渊源。

在上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同时，我也给同学们上“西方社会思想史”。思想史和社会理论之间既存在着知识谱系上的连续性，又存在着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比如布林顿肯定反对以社会理论的方式来研究社会，他曾对社会学嗤之以鼻。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进程已经给现代社会确立了基本的规范立场，或者说“意识形态终结”时代已经初步来临，那么，社会理论到底要做什么？它到底是否能够在知识层面或者规范层面给现代社会作出属于它的贡献？进一步而言，社会理论如何面对18世纪以来就已确立的规范理论呢？这是我们在研读经典社会理论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难题，涂尔干所面临的知识难题亦即在此。结合思想史和社会理论的知识积累，我意识到涂尔干与霍布斯、卢梭等人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张力，涂尔干所创设的社会理论，并不反对个人主义，他同情并支持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对人的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涂尔干反对“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卢梭和康德意义上的），他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更加社会学化、经验化，因此，他试图通过他以及他团队的工作，来精致化个人主义，并且是“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精致化”。在涂尔干的年代，社会学直面自然法哲学家以及启蒙运动的理论预设，但它们的个人主义假设与契约团结理论无法为道德真正奠基。基于新的团结理论，涂尔干对契约团结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对个人主义进行重构，从启蒙运动和自然法学派所预设的先验的个人主义中摆脱出来，寻求社会团结真正的源泉，重新为共和国奠定精神基础。换言之，对个人主义的重构，需要从哲学向社会学的转化，以社会学方式重构个人主义。

在涂尔干看来，一切都是历史的，也都是社会的。自然法学派所构想的契约理论以及理论背后的个体假设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便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如果社会契约论所描述的现象具有客观性，同时经由契

约还能够带来道德，那么，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理由否定社会契约论以及自然法学派所预设的社会秩序。但恰恰在这两点上，涂尔干认为社会契约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正是他要去做的工作，换句话说，他要重新为个人主义的正当性找到辩护的理据。这种辩护是在道德的方向进行的，即是说，如果个人主义或者社会进步，不能伴随着道德行为的话，这种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是不能得到辩护的，涂尔干的工作，便是要论证个人主义的时代，伴随着道德的行为和道德的进步。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的意图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经验对个人主义所作的社会学解释，是区别于自然法学派而对个人主义渊源的全新理解。

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自然法学派的核心概念“契约”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尤其是需要对契约背后的条件进行社会学的说明。在涂尔干看来，自然法学派理论中的社会，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似乎是从个体的理性契约中形成的，但通过契约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一瞬”，又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卢梭的契约团结理论是对历史的虚构；涂尔干再三强调的是，社会契约不是经由“孤立个体”之间的协商而达成的，相反，契约背后的精神根据是社会，个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如果没有社会的依据，则无法得到承认和实施，甚至根本就无法订立出来。这就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反复提到的“契约中，也并非一切都是契约的”这句话的含义。因此，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只有它能够为契约赢得尊重，契约本身无法为契约赢得尊重。从孤立个体出发的社会契约论，无法证成社会契约得以尊重和实施的内在依据，在涂尔干看来，契约的内在根据来自于社会的意识和认同，契约和法律只是社会意识的表征形式。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将对涂尔干的思考名之为“以社会学重构个人主义”，这种重构直接与卢梭等自然法学派进行对话，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论证个人主义、为个人主义的正当性提供经验式的论证。社会学的承诺也正体现在这里，“这个许诺就是，要通过把道德与社会体系的要求相联系，而不是根据来自先天原则的演绎过程‘以哲学的方式’看待道德，

从而为道德提供科学的基础。社会学发现并阐明了唯一能够确保当时法国社会统一的信念。涂尔干宣称要通过这种方式为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权威性的支持，在涂尔干社会科学上升到权威地位并成为法国教师培训学校课程设置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这一主张是一个决不容忽视的因素”（贝拉米，2008：112）。从2008年开始，断断续续，这篇文章写得异常艰辛，甚至几度放弃，直到2013年在美国的时候，才有时间把文章写完，但依然不能令自己满意。

在阅读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时候，我注意到涂尔干对“世界主义”的思考，《社会分工论》是与社会学系2011级的研究生一起阅读的，读得较为仔细。后来在阅读这本书的基础上，我开始动手写《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一文。我思考的重点是，人类的目标高于民族的目标吗？或者说，普遍主义如何与民族主义达成和谐呢？这一问题，如此重要，尤其是在涂尔干的年代，是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是源于涂尔干多次讲到群体生活对于道德形成的影响，但我们又知道，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不同群体之间的地位和性质都存在着差异，那么，不同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换言之，何者占据优先位置呢？涂尔干通过赋予民族国家以“优先地位”而刻意地消解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矛盾。而关键又在于，涂尔干还必须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中来解决世界主义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突出了“政治”的重要性，这尤其体现在涂尔干对法人团体和国家的相关论述中。我试图指出来的是，第一，区别于“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涂尔干的个人主义强调权利是争取而来的，权利并不能够从天而降，或者说涂尔干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天赋人权”，权利的实现需要现代个体积极地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第二，在个体参与政治生活中，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尤为关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而非禁止性的外在约束；第三，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法人团体不但是生活共同体，也是政治团体，甚至是政治社会中特别重要的政治参与单位。在职业群体中，与职业利益相关的选举活动，都会使

得每个人积极地参与进来。通过职业单位这种组织，每个人得到组织、受到锻炼、成为热心公益的公民。涂尔干认为，如果是这样，每个公民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变成政治家。“要想这样做，我们的政治行动就必须创建这些次级机构，当这些机构形成的时候，会把个人从国家中解脱出来，反之亦然；同时，它们也会把个人从他不合时宜的任务中解脱出来。”（涂尔干，2006：87）当然，就对现代人的组织与政治训练而言，职业群体固有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不同群体之间如何交流、群体内部的矛盾如何化解、群体利益如何与公共利益协调，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都导致职业群体在锻造公民的角色扮演中，有着严重的不足。这是涂尔干所没能予以关注的地方。

三

也正是在阅读经典社会理论的时候，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劳动”概念的重要性，如同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一样，涂尔干、韦伯等人将“劳动”概念提升到全新的历史高度，并试图从“劳动”出发来理解现代社会的组织原理，探索现代社会的团结机制。因此，现代性与劳动叙事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和事实关联，劳动成为现代个体自我和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现代性离不开“劳动叙事”，它需要劳动叙事来正当化自身，而劳动叙事则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全新的叙事方式。与之相区别，前现代的劳动概念更多地指涉道德和社会的含义。

但劳动叙事的正当性却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这是因为劳动叙事与政治叙事、道德叙事之间存在着隔离，从而劳动叙事无法叙说现代性的完整故事。现当代以来，劳动叙事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吉登斯、哈贝马斯、鲍曼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超越劳动叙事，发现劳动叙事之外的现代机理，重建现代社会的全新叙事。在现代性危机面前，社会理论

家们积极“寻找政治”，重新寻找规范性伦理的可能性，在这些方面，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立场。在这里，实际上意味着存在着经典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的疏离，这尤其表现在两者对“劳动”概念的不同理解上。换言之，在阅读《社会分工论》的同时，我也在反思《社会分工论》的局限，即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实际上无法提供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关于分工的道德作用，涂尔干无疑是夸大其词了，而韦伯则谨慎得多，他处于马克思和涂尔干中间，持论中庸。涂尔干本人晚年的宗教转向，也意味着他意识到社会分工本身的局限，而试图去发掘宗教对于道德和社会的积极意义。正是在此种思考基础上，我着手来写《超越劳动叙事》一文。

与此同时，超越劳动叙事，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现代人进行重新理解，换言之，人不仅仅是劳动动物，他是更为复杂的存在，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基于劳动对人的理解和解释，还远远不能够切入人真正的“本真性存在”。这一超越劳动的努力，在吉登斯、哈贝马斯、鲍曼以及阿伦特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对人的重新关注的代表性理论。吉登斯指出，人是复杂的社会存在，并不能够仅仅基于生产或者劳动而得到全部的解释；马克思虽然深刻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之异化的可能性，即工人丧失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控制权，社会关系完全商品化了，但却低估了人之能动性的方面。吉登斯意识到，生产既不是人类社会的开始，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结束。他更加认同芒德福把人称作是“一种能够下定决心、自我支配和自我设计的动物”，也更加认同弗兰克尔把人类生活看作是对“意义的寻找”，他们这种对人的理解，比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更接近于为人类提供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是吉登斯所极力反对的，人类的概念在他那里更为丰满。在吉登斯对“控制的辩证法”以及对结构二重性理论的构想中，实际上已经涉及更加全面且复杂的人的概念了。完全可以说，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以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基于劳动和生产关系而建

构的主体意象的深刻反思，并基于他的二重性理论而对个体进行了更具能动性的建构。在这里，吉登斯还恰当地引入了政治概念，来说明个体的能动性以及对总体性权力的反抗，而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引入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而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总之，政治上的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帮助促进了劳工运动的发展，它们既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构成了挑战，也是促使其变化的一大力量。”（吉登斯，2010：229）这是劳工群体“防御性控制”的开始，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劳工运动得以诞生。

哈贝马斯的伟大贡献在于，他重新激活了我们对规范理论的信心，并对相对主义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批判，更关键的还在于，他建构了较为适合这个时代的规范性理论。他不但批判了韦伯社会理论中规范意识的缺失，也指出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狭隘之处。哈贝马斯的理论意图在于，如何从社会关系与社会意义的规范性立场来重新阐释和建构现代性。这种重构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进行的，尤其是哈贝马斯所提到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反思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我们需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劳动概念。这种社会关系是指，每个人都是公民，需要也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并基于这种公共论辩的空间而形成对社会与自我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重新将“政治”的维度引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亦就此重构了现代的“政治想象”。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承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劳动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经验最为核心的方面，但这种合理性需要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体现在阿伦特对政治的极端重视之上。他认为，人是复数的存在，这是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每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马克思试图将之规划为整齐划一的模型，这无疑会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在阿伦特的视野中，人是能动而富有活力的主体，不会轻易地受制于外界的影响，而是完全有可能对外部世界提出自身的看法。这样一来，在马克思那里的“单一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阿伦特所论述的主体是多重复合的，这尤其体现在人与政治的本体

性关联上。因此，我们需要政治地思考，而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这便是阿伦特的政治本体论。

因此，核心的关注是政治的和规范性的。吉登斯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 18 世纪所提出的那么多规范性理论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吉登斯本人是在这样一个疑问的前提下建构他的理论体系的。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何为善的社会？”这一启蒙式的问题，我们应该抛弃那种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主张，而重新回到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人类作为伦理道德存在的基本预设上去。这种关于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主张，以及对现代人的伦理关注，无疑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社会理论或者说社会学不能无视这些理想或者说价值，社会学应该在这些高贵的价值基础上，超越琐碎的经验研究，回到更加根深叶茂的大地上。

四

1944 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出版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在我看来，波兰尼承继了三个多世纪以来对当代制度批判的余绪，重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与敏锐意识。当然，与一些理论过于抽象的学者相较，波兰尼以基于历史（分析资本主义的缘起）与现实（对战争灾祸的制度性关注）的维度，以细腻的笔触直指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自律性市场）的弊病，更多的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分析，娓娓道来，发人深思。

2010 年左右，在给学生讲授“发展社会学”课程的时候，我曾花过较多的时间来阅读诺斯，尤其是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书，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书对我们理解西方世界有着独特的价值。有意思的是，我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注意到诺斯对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的直接而犀利的反驳，这令我很着迷。我曾在邓正来老师的课堂上认真地阅读过波兰